

DOI: 10.3969/j.issn.1672-8874.2012.04.021

· 教育管理 ·

知识生产方式转型及其对 大学学术组织影响的研究综述

林子涵, 陈勇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73)

[摘要] 在知识生产方式转型的过程中, 大学学术组织及其知识生产活动越来越受到新型知识生产方式的影响。本文对有关知识生产方式转型的观点进行了梳理, 并从组织职能、结构框架、制度安排等方面就知识生产方式转型对大学学术组织的影响进行了文献综述。

[关键词] 知识生产方式; 大学学术组织; 影响; 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2012)04-0067-04

A Summarization of the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 and Its Impact on College Academic Organization

LIN Zi-han, CHEN Yong

(College of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 the university academic organization and its activitie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re more and more influenced by the new mod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 and makes a summarization about the impact produc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 on the function of the university academic organization, its framework,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nd so on.

Key words: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 university academic organization; impact; summarization of the study

所谓大学学术组织, 有学者认为是“大学中通过加工高深知识而承担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职能, 的组织”,^[1]也有学者认为是“以知识的继承与创新为目标而进行合理的管理与协调的、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大学基本实体”。^[2]无论我们如何界定大学学术组织, 都离不开知识这个核心内容。“如果有什么东西对于高等教育是基础性的话, 它就是知识的中心概念。”^[3]由此可见, 知识是大学学术组织的核心素材, 加工高深知识是大学学术组织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主要特征。进入20世纪中后期以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研究的商业化, 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开始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知识生产方式转型的过程中, 知识生产活动越来越受到新型知识生产方式的影响, 不同领域的学者开始密切关注有关知识生产以及知识生产方式转变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作为知识探究、生产、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场所, 大学学术组织与知识一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高等教育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知识生产方式转型与大学学术组织变革联系起来, 就知识生产方式转型对大学学术组织产生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探讨。本文将首先阐述大学学术组织研究的知识视角, 然后在对

知识生产方式转型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的基础上, 就知识生产方式转型对大学学术组织影响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综述。

一、大学学术组织研究的知识视角

大学学术组织自中世纪产生至今, 教会的影响、国家的作用、市场的力量等各种外部要素不断变换, 但就大学学术组织发展的内部要素而言, 唯有知识是其中的不变量, 以知识为联结的大学教师和学生是大学学术组织永恒的内容。但是很长时间以来, 学者们对大学学术组织内部的研究, 大都忽略了知识的视角, 就是整个高等教育研究领域, 也缺乏对知识的广泛关注。Gumport指出, 在高等教育领域, 很少有聚焦于知识的分析。^[4]英国学者马尔科姆·泰特在研究了2000年出版发行的17种专业期刊上的406篇论文和284本高等教育研究著作后发现: “从很多方面来说, 知识问题最基本, 并且最具有理论色彩, 但相关的研究却最少。”^[5]国内学者陈洪捷教授认为, 在当前有关大学学术组织的相关研究中, 大部分集中于教学或者大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 很少涉及高等教育的

[收稿日期] 2012-11-15

[作者简介] 林子涵(1988-), 女, 四川成都人,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高深知识。“高等教育无论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还是作为一个学科,似乎对高深知识并不关心。”^[6]他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一书来说明这一现象,该书收录了从1949-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及相关目录,研究问题包括课程理论、教学实践、教育经济管理、德育等多个方面,既有理论探讨,又有管理实践,但“几乎没有涉及高深知识的问题”。^[7]2006年第4期出版的《北京大学教育评论》中曾专门以“高等教育的知识维度”为主题,其绪言中提到,“从高等教育的研究来看,我们对高等教育知识维度的研究还十分有限。”

在高等教育研究中,还是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注意到了知识对于大学学术组织的重要性,指出“高深专门知识是研究大学学术组织一切问题、一切现象的逻辑起点”,^[8]并从知识的视角对大学学术组织的本质属性、职能、组织结构以及制度安排进行了探讨。

有关大学学术组织的本质属性,尽管学者们的表述各有不同,但几乎都强调大学学术组织是从事知识生产的主要场所,知识是大学学术组织所有活动的载体,是大学学术组织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最核心的要素。“知识性是大学学术组织与生俱来的禀性”。^[9]在这些研究中,伯顿·克拉克的论述最具影响力,他鲜明地指出,大学组织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知识材料,尤其是高深的知识材料,处于任何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和实质的核心。不仅历史上如此,不同的社会也同样如此。”^[10]

从知识的视角来看,大学学术组织职能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早期的学者将大学学术组织的职能定位于单纯的教学,即知识的保存与传播。如纽曼在分析知识性质的基础上,主张大学学术组织应该只进行知识的传授,并对洪堡所提出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提出了比较鲜明的反对。^[11]随着历史的发展,大学学术组织的职能得到了拓展。不少学者指出,大学学术组织发挥着保存与传播知识、创造知识、应用知识三大职能。如张德祥将高深知识的保存、传播、发现和应用作为大学学术组织活动的基本任务,“知识的保存与传播即教学,知识的发现即科学研究,知识的应用即为社会服务”,^[12]而“通过科学研究来创造和应用新知识,是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的生命所在。”^[13]

此外,还有学者从知识的视角对大学学术组织的组织结构松散结合的特性和内部制度安排进行了分析。松散结合是大学学术组织不同于其他组织的结构特性,即组织的基本构成要素,如学院、学系以及从事高深学问的教学与研究的教授、学者,在组织的运行过程中各自保持一种独立自主、低度联结的工作状态或组合方式。樊平军认为这种特性的根源在于知识的分化,并指出“知识发展的专门化与聚集是大学组织松散结合的前提,而学者们不同的知识背景则进一步加剧了大学内部各组织之间的松散结合。”^[14]朴雪涛在其博士论文中从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角度研究了大学学术组织的制度安排,他将大学学术组织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的各项规则总称为知识制度,包括内在知识制度和外在知识制度两种形式,内在知识制度与外在知识制度的张力是大学学术组织发展的动力源。^[15]

以上研究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大学学术组织与知识之

间的密切联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知识的视角来研究大学学术组织,不仅能在理论上找到大学学术组织合法性最坚实的基础,也为大学学术组织在实践中的发展提供了指南。

二、知识生产方式转型的主要观点

知识生产方式是一种认识的方式,其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有效的方法或手段来保存和获得知识。20世纪70年代以后,“科学转型”、“研究转型”或“知识生产方式转型”的研究成为科学社会学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有关知识生产方式转型的研究,国内学者的关注相对较少,国外学者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为了解释这一转型,他们先后提出了“大科学”、“后规范科学”、“后学院科学”、“知识生产模式2”、“三重螺旋”等概念,识别了不同的知识生产方式。以下几种转型理论是当前最为有代表性,有助于我们清晰的认识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过程。

(一) 普莱斯:大科学与小科学

美国学者普赖斯于20世纪60年代在其代表作《大科学,小科学》中提出了“小科学”和“大科学”的概念。^[16]他认为,在“小科学”年代,知识的生产体现为科学家个人的自由探索,通常由科学家凭借个人的研究兴趣确定研究题目,研究内容大多集中在单一学科内,形成了“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家自主研究氛围。但随着研究难度的增加、研究经费的庞大、跨学科问题的出现以及个人能力的限制,这种知识生产方式逐渐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大科学”方式应运而生。普赖斯指出知识生产已经从学科内部的发展转向了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研究,这种合作可以是科学家个人之间、科研机构或大学之间,甚至地区或国家之间的。

(二) 齐曼:学院科学与后学院科学

齐曼在《真科学》中也区分了知识生产的两种方式:学院科学与后学院科学。齐曼认为,“我们见证了在科学组织、管理和实施方式中发生的一个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遍及世界的变革,知识生产方式走向了后学院时代”。^[17]他指出,学院科学是一种高度分化的体系学科,可以理解为存在于大学和研究中心等学院类机构之中的“为知识而知识”的、与市场利益保持一定距离的纯粹的研究活动,而后学院科学是学院科学在“应用语境下运转的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是学院科学向产业领域的扩展,是“根据市场原则组织的”、“与实践之网络紧密纠缠在一起的”科学体系,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18]

(三) 吉本斯:模式1与模式2

20世纪90年代初期,吉本斯等人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中科学与研究的动力》中指出,“我们正经历着科学、社会和人文知识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传统的以理论独尊、试验性科学、学科内部驱动、以大学为核心的知识生产范式(即模式1),正在被新知识生产方式(模式2)所取代”。^[19]根据他们的观点,传统的模式1知识生产于专业学科背景之下,致力于纯粹的科学的研究,研究成果由学科内的同行来进行评价。模式2则完全不同,它发生在更宽泛的跨学科的社会背景下,科学知识的生产在应用的情境中进行,强调多样化的技能、跨学科的合作、组织

的柔性以及知识的实用价值。

(四) “三重螺旋”

“三重螺旋”是美国学者埃茨科维兹和雷德斯多夫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认为，大学、企业与政府三者边界已经慢慢模糊，原先分割的各个领域正在逐渐会聚，传统的由“需求牵引”和“学科推动”的知识生产线性模式正在被“三重螺旋”下的跨学科、跨组织、跨地域、跨国界的合作模式所替代。^[20]三重螺旋理论对大学、企业与政府在知识传播、生产与应用过程中的职能进行了重新界定：大学不仅仅是以知识传播、高素质人才培养为主，同时进行知识传播；政府的职能，从当前直接组织创新活动为主，转向以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提供政策指导和服务、促进各组成部分间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为主；企业则集中在技术创新、知识创新、技术转移和知识应用方面。

以上几种理论的提出均引起了较大的学术反响，国内外学者就此展开了相关的学术探讨。不少学者就新型知识生产方式的特征进行了归纳，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知识生产的应用语境，在新型知识生产方式中，研究问题的选择往往来源于真实的社会，研究的宗旨、研究成果的传播受到实际问题发生背景的影响。二是知识生产的跨学科性，研究者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单一学科的知识显得力量单薄，通常需要运用一系列超出单一学科知识范围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三是知识生产组织的异质性和多样性，“新的知识生产是在应用的语境下进行的，主要标志是新的知识生产组织的出现”。^[21]研究者的构成和知识生产场所都体现出异质性的特点。四是知识生产的社会问责，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在服从学术性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到研究对知识需求者的满足程度，以及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五是质量控制的新形式，在新的知识生产方式中，同行评估不再是可靠的质量评估方式，单一的评价标准已经无法判断研究成果，评价标准体现出多元的特征。

三、知识生产方式转型下大学学术组织变革

由于大学学术组织与知识的密切联系，因此，知识生产方式转型的理论一经提出，就引起了高等教育领域的普遍关注，不少学者将新型知识生产方式与大学学术组织变革联系起来，相关研究论文大量涌现，并呈逐年递增趋势。在当前的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研究从组织层面探讨了知识生产方式转型对学术组织的影响。归纳起来，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一) 组织功能

学者们一致认为，知识生产方式转型使得大学学术组织的功能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大学学术组织在新型知识生产方式下，不仅进行知识的保存与传播，还承担起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职能，通过知识的发现与应用为社会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如陈亚玲认为，“大学学术组织的职能从最初保存知识的职能及其后发现知识的职能，拓展到当今的使知识资本化的职能”。^[22]胡丽莎的表述是，“大学学术组织正逐渐成为整个经济创造财富的科学技术发动机，不仅保存、传播知识，并想方设法将知识资本

化”。^[23]

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学者们认为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来自大学学术组织内部，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内在决定了大学学术组织功能的变化。陈亚玲认为，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秉持了“单价知识观”，即将知识划分为理论的、实践的、产业化的等等，知识的生产和扩散遵循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顺序，而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反映了“多价知识”的观念，认为知识同时是理论的、实践的、可商业化的和公开的，并且在一些领域内，应用研究与开发、产业化的过程可能与基础研究同时进行。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决定了大学学术组织的职能不仅是进行知识传播与发现，同时也可以进行技术的开发与转化。^[24]二是源于大学学术组织外部知识发现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随着社会中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和专业知识的人才越来越多，知识生产呈现出社会弥散的特征，各种政府研究机构、企业的研发部门以及一些社会组织加入到知识生产的行列中。有学者指出，“大学学术组织已经不再作为知识生产的唯一载体，它的优势地位正在受到其他组织的冲击”。^[25]大学学术组织为了在未来的知识生产中继续保持主力军的低位，必须进行功能上的拓展。

(二) 结构框架

大学学术组织功能上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组织的结构框架。从当前的研究来看，几乎所有学者都指出，在新型知识生产方式中，大学学术组织不能固守原有的院系或研究中心的结构，而要建立以“问题逻辑”为导向的、结构比较松散的新型组织架构。王爱萍认为，新型知识生产方式的出现使得组织机构出现了信息化、分散化、虚拟化、小型化的发展趋势。^[26]沈玄洪提出应该构建学科导向、项目导向和市场导向相结合的立体网状矩阵式学科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纵向上以学科为导向，主要由学科带头人垂直领导，体现学术权威和学科追求真理的本质，横向上以项目为导向，按项目任务实现管理，以解决各种经济、社会、科技、教育等实际问题为目标。^[27]

归纳起来，新型知识生产方式下形成了两种比较典型的组织结构：

一是跨学科组织结构。跨学科组织是一种矩阵型组织结构，主要表现为大学中的研究中心。这些中心既有隶属于学系、学院等不同层次学科组织的形式，也有独立于学系或学院之外的独立组织形式，其中后者是一种典型的跨学科研究组织。跨学科组织结构的兴起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在新型知识生产方式中，大学学术组织需要对诸多社会问题做出回应，传统的以单一的学科为基础的组织结构已经很难独自承担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许多研究课题、项目都必须整合多个学科研究者的知识才能解决。

二是混合组织结构。混合组织是大学学术组织与政府、企业之间，围绕知识生产与转化这一主题，所建立的跨越三者边界的组织形式，如研究中心、技术转移办公室、孵化器、科技园等。混合组织的兴起主要是由于新型知识生产方式下大学学术组织与政府、企业之间关系的变化：首先，就组织与政府的关系而言，“政府从科学事业的资助者向管理者角色转变，大学不能再依赖政府而必须寻找其它的资助者”。其次，就组织与企业的关系而言，“传统上

的知识和人才由大学向企业流动的线性单向关联,正在向非线性的交互关联转变”^[28]

(三) 制度安排

知识生产方式转型下,有关大学学术组织制度变革涉及的内容比较多,从对现有文献分析的结果看,学者们研究比较深入的主题集中在学术组织的管理模式和评价机制两方面。沈玄洪认为,与传统知识生产方式下的管理模式相比,大学学术组织应该实施项目领导负责制,即根据人员所具有的知识能力,为每个解决问题的项目小组安排一名负责人,由负责人来安排每个小组成员的分工,协调小组内、外的交流合作,并督促小组成员在其责任范围内保质保量地完成工作。当问题解决后,项目小组解散,小组成员或返回职能部门,或参与其它的项目研究。^[29]王爱萍认为,新型知识生产方式下的学术组织应该由传统科层体制向更具柔性和弹性的管理模式发展。^[30]评价机制方面,由于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大多以跨学科、跨部门的方式进行,因此,不少学者提出应该实行跨学科、跨部门评价机制,建立多元的评价标准。沈玄洪认为,“评价指标除了学术价值、人才效应、投入产出率之外,还要涉及团队及成员科研活动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评价的主体应该包括学科内专家、同行、知识传播者和知识使用者等利益相关者,还要引进社会监督,在多方面博弈的情况下保证知识生产的社会责任。”^[31]

四、结束语

近年来,有关知识生产方式转型与大学学术组织变革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从组织职能、结构框架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就知识生产方式转型对大学学术组织的影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这些研究充分说明,知识生产方式转型的相关理论正在成为有关大学学术组织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在研究视角上。从知识的视角来解读大学学术组织的研究还比较有限。大学组织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知识是在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无形材料。从知识的视角研究大学学术组织,不仅能在理论上找到大学学术组织合法性的最坚实的基础,也为大学学术组织在实践中的发展提供了指南。二是在研究内容上。大部分研究文献涉及的主题较多,内容较为宽泛,有关大学学术组织制度方面变革的文献不够集中,如探索新型组织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完善评价与激励机制等主题,大多数文献都仅仅是点到为止,缺乏深入的阐述。三是研究方法上。虽然我们欣喜地看到有个别文献采用了案例研究的方法,但大部分研究在方法的选择较为单一,文献研究、思辨方法占了绝大多数。以上这些研究的不足也为我们进一步拓展相关主题研究的空间提供了各种不同的选项。

[参考文献]

[1] 季诚钧. 大学属性与结构的组织学分析[M]. 北京:人民教育出

版社,2006:124.

- [2] 向东春.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属性透视[J]. 高等工程教育, 2006(3):104-106.
- [3] Frans Van Vught. The new context for academic quality. David D. Dill and Barbara Sporn. Emerging patterns of social demand and university reform: through a glass darkly [M]. London: IAU Press, 1995:202.
- [4] Patricia J. Gumpert. Academic Pathfinders: Knowledge Creation and Feminist Scholarship [M].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2: 3.
- [5] 马尔科姆·泰特. 高等教育研究进展与方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84.
- [6][7] 陈洪捷. 论高深知识与高等教育[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6(4):2.
- [8] 高桂娟, 王培根. 大学组织的知识属性及其制度根源[J]. 理论月刊, 2007(4):97-99.
- [9] 约翰·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 等. 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 [10] 伯顿·克拉克. 高等教育系统[M].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11.
- [11] 约翰·纽曼. 大学的理想[M]. 何曙荣, 等. 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 [12] 张德祥. 关于“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几点思考[J]. 辽宁教育研究, 2005(8):1-4.
- [13] 詹姆斯·杜德斯达. 21世纪的大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9.
- [14] 樊平军, 毛亚庆. 论大学松散结合组织特性的知识根源[J]. 高等教育研究, 2007(6):51-54.
- [15] 朴雪涛. 知识制度与大学发展[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 2002.
- [16] D·J·普莱斯. 小科学·大科学[M]. 宋剑根, 等. 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2:2.
- [17][18] 约翰·齐曼. 真科学[M]. 曾国屏, 等. 译.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81, 83.
- [19][21] Michael Gibbons, etc.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179, 179.
- [20] Hery Etkowitz, Loet Leydesdorff: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From National Systems and Model 2 to a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 - Industry - Government Relations [J]. Research Policy, 2000: 29.
- [22][24][28] 陈亚玲. 浅析模式2知识生产与当代大学的变革 [J].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2010(3):77-80.
- [23] 胡丽莎. 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与创业型大学的兴起[J]. 教育学术月刊, 2012(3):48-51.
- [25][27][29][31] 沈玄武, 郭石明. 新知识生产模式下大学学科组织面临的挑战[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 2011(2):154-157.
- [26][30] 王爱萍. 知识生产方式转型与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J]. 高教探索, 2011(5):96-100.

(责任编辑:卢绍华)